

海上丝路与广东古港

HAI SHANG SI LU YU GUANG DONG GU GANG 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

黃启臣 著

鄭州大學圖書館藏

黃启臣題

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文史馆）
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
《珠江文化丛书》编委会

主 任：周 義

委 员：周 義 何善心 余庆安 罗康宁
陆庆忠 刘凤英 麦淑萍 黄 尤
朱崇山 陈其光 黄伟宗 洪三泰
黄启臣 陈永正 谭元亨 张镇洪
戴胜德 司徒尚纪

总主编：黄伟宗

目 录

多学科交叉的立体文化工程

- 《珠江文化丛书》总序 黄伟宗(1)
- 自序 黄启臣(5)

第一编 海上丝绸之路与古港

- “丝绸之路”考释 (9)
- 海上丝绸之路与广东古港 (24)
- 徐闻是西汉南海丝绸之路的出海港 (53)
- 唐代广州是中国海外贸易的第一大港 (57)
- 试论澳门港的兴衰 (84)
- 清代的黄埔港 (106)

第二编 海上丝绸之路与珠江

- 从西江在汉唐的经济发展看珠江文化 (115)
- 广信是西汉海上丝绸之路与内地互动的枢纽 (126)

第三编 海上丝绸之路与广东外贸

- 略论元代广州的海外贸易 (133)
- 明代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的高度发展 (151)
- 清代前期广东的海外贸易 (263)
- 广东在贸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场地位 (291)

第四编 海上丝绸之路与广东商人

郑和下西洋与广东商人的海外移民	(303)
清代活跃在中日贸易及日本港市的广东商人	(317)
清代广府商人与岭南文化	(325)
广东十三行之一:同文行行商潘启其人	(337)
广东十三行之一:梁经国天宝行的演变	(388)

多学科交叉的立体文化工程

——《珠江文化丛书》总序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域、一个地方的特点，从总体精神上说，实则是文化特点。其特点的形成，是由不同的地理条件（尤其是水的条件）和气候条件，使得人们有不同的生存方式、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而长期造成的不同的精神意识、思维方式、人情风俗和道德观念等等。这些属于文化范畴的特征，既决定着又体现于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每个地域、每个地方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实体、措施与形态，以及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的研究思想和文学艺术的创作与研究中。正如法国 19 世纪著名理论家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所说：“要了解艺术家的趣味和才能，要了解为什么在绘画或戏剧中选择某部门，为什么特别喜爱某种典型，某种色彩，某种感情，就应当到群众中的思想感情和风俗习惯中去探求。由此我们可以定一条规则：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就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这是艺术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根本原因。”

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了文化时代，也即是改变了过去只是以政治观点和政治利益去认识和把握一切，代之以从文化意识与方式去认识和把握一切的时代。西方各国现代文化学的兴起，学派林立，形成热潮，蔚然成风；中国的“文化热”也从文艺创作而蔓延于各行各业、各种学科、各个地域、各个地方，以至人们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其中，水流地域文化研究，如：黄河文化、长江文化、黑龙江文化等的研究，正在悄悄兴起，这是一种很值得注意的动向，是一个很有意义、很有前途的文化与学术领域。

因为这个领域的研究,将会给每个水流地域总体特征作出科学的解释,找出其历史与现实和将来的契合点,并以多学科の并行和交叉研究论证的方法,将这些契合点科学化、综合化、立体化、实用化,使其可作为决策的依据或出发点,作为具有实用价值的新产品或具有可操作性的方略,具有可转化为生产力的科学理论或文化精品。

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正是适应这样的文化时代潮流和需要,于2000年6月28日在广州正式成立的。宗旨是研究与弘扬珠江文化。因为珠江是中国的第三大河,其水流地域文化覆盖整个华南和南海诸多港湾和群岛,在中华民族历史和现代的文化上有重大贡献和重要地位。按照当今国内外公认的水流地域文化理论,当某种水流地域文化形成之后,除覆盖其本身水域之外,还覆盖其周边地区。由此,珠江文化的覆盖地域,不仅是作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以及汇合为珠江的西江、东江、北江的各自流域地带,还包括韩江流域的潮汕地区、南渡河流域的雷州半岛,南海诸岛和北部湾、海南岛、香港和澳门;如从水流的源头而言,除西江流经的广西之外,尚有西江的源头云南、贵州,北江的源头湖南,东江的源头江西,韩江的源头福建省等,可见地域之广,水量丰富,文化组成成份多样而复杂,历史的发展和演变过程又极其曲折坎坷,在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中的发展又极其迅速。因而以珠江文化作为一个研究领域,不仅是应时之需,而且是天地广阔,前景无限的。

珠江文化有着明显的特点。首先是它的多元性和兼容性,这特点似乎与珠江是多条江河自西、北、东之流而交汇的水态有关,是多元而后交汇汇聚兼容于一体之中:从历史上说,由土著的百越文化与来自五岭以北的华夏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以及来自海外的印度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西洋文化的先后结合与交融;从当今的珠江水流地域的文化类型而言,除此较明显的粤文化地区有着广府文化、客家文化、福佬文化和新起的深圳及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移民文化之外,尚有可称之为珠江亚文化的滇云文化、黔贵文化、八桂文化、海湾文化、琼州文化等等,都是多元而兼容于珠江文化的范畴中。其二是海洋性和开放性,珠江的总

体形象，既是交汇型的，又是放射型的，它既像是蜘蛛网似的覆盖于整个水流地域，像是多龙争珠似的争汇于其中交汇中心（广州），而其中心又像是一颗明珠、每条河流又像是道道明珠发射出的光芒那样，向四面八方喷射。特别是珠江有众多出海口，即许多所谓“门”，如：虎门、崖门、磨刀门等等，仅珠江口就有八个门，可见珠江与南海是联成一体的；沿海港湾和港口甚多，也都同珠江水系密切连接，所以，从古至今是由陆路、沿海与海外的交通与交流枢纽，“海上丝绸之路”最早在此进发，而且数千年一直不衰：大量移民由此散布海外，海外文化也由此最早涌入，所以，海洋文化与开放意识是特别强的。其三是前沿性和变通性，由于珠江文化水系与海洋密切连接，海港特多，与西方和海外文化接收特快特多，因而前沿性也特强，另一方面，相对而言作为中国文化中心的中原文化，地理距离较远，又有以五岭为代表的崇山峻岭之隔，交通不便，由此而受中原文化控制偏少，同时也由于中原文化在这一带与海洋文化及本土文化碰撞的缘故，也就造成了相接于前沿性的变通性。此外尚有其他特点，有待深入研究，在此不一一列举。仅由此即可见，对珠江文化特点的研究，以及将这样的研究成果转化为决策依据，地域建设的方案与行为，转化为科学规划的文化产业，都是大有作为、必有成效的。

本着研究与弘扬珠江文化的宗旨，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组织了著名的文化学家、文史学家、考古学家、人类学家、语言学家、民俗学家、地理学家、海洋学家、气象学家、建筑学家、生物学家等学科的专家学者，以及著名的作家、编辑家、新闻出版家等，分别组成学术委员会、创作委员会、书画艺术委员会、地域企业文化委员会、影视出版委员会、规划策划委员会和理事会，既分工而又交叉地进行珠江文化的研究和宣传，将其作为一项长期的多学科交叉的立体工程去进行。为此目的，我们依靠和组织各种力量，撰写、编辑、出版《珠江文化丛书》。

黄伟宗

2001年1月1日

2001—2005 已出版著作：①《开海》（洪三泰、谭元亨、戴胜德著）；②《千年国门》（谭元亨、洪三泰、戴胜德、刘慕白著）；③《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诗选》（陈永正编著）；④《广府海韵——珠江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谭元亨著）；⑤《交融与辉映——中国学者论“海上丝绸之路”》（黄鹤、秦柯编）；⑥《东方的发现——外国学者谈“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徐肖南、施军、唐笑之编译）；⑦《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黄启臣等编著）；⑧《珠江文化与史地研究》（司徒尚纪著）；⑨《祝福珠江》（洪三泰、谭元亨著）；⑩《通天之路》（洪三泰主编）；⑪《珠江文化论》（黄伟宗著）；⑫长篇小说《女海盗》（洪三泰著）；⑬《岭南文化古都论》（谭元亨编）；⑭《岭南状元传及诗文选注》（仇江、曾燕闻、李福标编）；⑮《东方奥斯维辛纪事》（谭元亨著）；⑯《日军细菌战：黑色 [波字 8604]》（谭元亨编著）。

现在出版的这套《珠江文化丛书》十家文谭专辑包括：黄伟宗著《珠江文化系论》，朱崇山编《珠江文化的历史定位》，周义编《海上丝路的研究开发》，司徒尚纪著《泛珠三角与珠江文化》，黄启臣著《海上丝路与广东古港》，罗康宁著《粤语与珠江文化》，张镇洪著《岭南文化珠江来》，洪三泰著《珠江诗雨》，谭元亨著《珠江远眺》，戴胜德著《珠江流韵》。“十家”，是以十位学者之所长从十个学科探析珠江文化之意。当然，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的专家学者，不仅只有这些学科。

2005 年 11 月 15 日又记

自序

一个机缘，1984年我参加中国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以汤明榭教授领头的《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研究》项目，按照项目要求的最终成果是编写一本《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史》出版。后经项目研究同仁讨论分工，我负责研究和撰写“明清时期广东海外贸易”这一章。从此以后，我在教书之余，着力搜集这一专题的中外文献资料，经过五年的搜索积累，于1988年写成和发表《清代前期广东的海外贸易》（《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1990年发表《明代广州的海外贸易》（《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等论文。

1990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由法国吉美博物馆长叶利世夫（Vadim Elisseeff）为“丝绸之路”综合研究国际委员会主席领队、有30多个国家的50多位科学家组成的考察队，乘坐“和平之舟”（Ship of peace）号航船，从威尼斯港起航出发，沿着当年“海上丝绸之路”途经16个国家的22个港口，对“海上丝绸之路”进行实地考察，于1991年2月9日到达广州，与广东学者在东方宾馆举行《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学术座谈会，我撰写题为《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和发展》论文参加会议，会后发表在《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论文集》（1991年）。以后，我陆续撰写和发表了与广东“海上丝绸之路”有关的论著。1995年出版了公认为“海上丝绸之路”东方第一大港广州的《广州外贸史》（第二作者），比较系统地阐述广州港在“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地位。2000年发表《广东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一文，明确指出广东和广州是16世纪中叶—19世纪初叶贸易全球化的中心市

场，后被收入《广东省志·丝绸志》（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而载于志书。

2000 年，由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和广东珠江文化研究会联合组成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开发项目得到省政府批准立项。又是一个机缘，我有幸参加该项目的研究，除了收集文献资料外，在 2001 - 2002 年间，还跟随由省参事室、文史馆、珠江文化研究会和广东省丝绸公司联合组成的研究考察组同仁到广东沿海的南澳、柘林、凤岭、樟林、白沙、大星尖、广州、香港、澳门、广海、阳江、电白、雷州、徐闻、合浦、钦州、防城等沿海古港和西江、北江、东江、漠阳江、南流江、北流江、韩江等进行实地考察。之后，我一方面撰写“海上丝绸之路”通过古港口和河流与内地互动的论文，另一方面撰写广东著名商人利用“海上丝绸之路”大力开展进出口贸易和行商在中外文化交流的地位等论文，从而说明“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中外贸易之路，而且是中外文化交流之路，更是广东华侨华人移居世界各国之路，具有深厚而丰富的内涵，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为今天经济全球化提供历史借鉴。

本书就是从我滥竽“海上丝绸之路”研究 20 多年写成的论文中选出 17 篇结集而成，书中各文所论，只是个人研究的心得和体会，不足甚至是错误之处，肯定存在，尚祈读者批评教正。

本书出版，得到广东省政府参事室（文史馆）、广东珠江文化研究会和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此，我要以白纸黑字诉诸笔端，衷心感谢这三个机构及其领导的支持和帮助。

是为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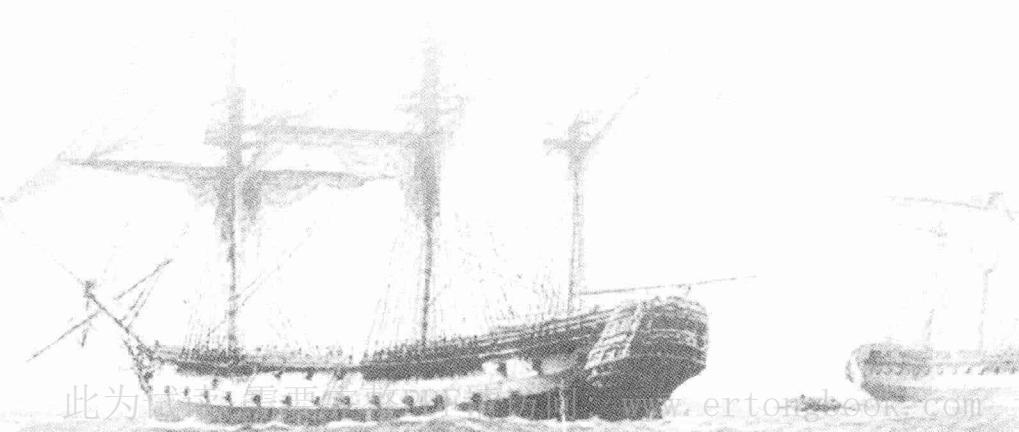
黄启臣谨识

2005 年 11 月 18 日

海上丝路与广东古港
HAI SHANG SI LU YU GUANG DONG GU GANG

第一编

海上丝绸之路与古港



“丝绸之路”考释

鲁迅先生说：“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1〕}

“丝绸之路”一词，在中国古代典籍未见记录。但在《辞海》、《中国大百科全书》有“丝绸之路”条目。《辞海》解释说：

古代横贯亚洲的交通道路。亦称丝路，其主要路线：东端起自渭水流域，向西通过河西走廊……等地……约自公元前第二世纪以后千余年间，大量的中国丝和丝织品皆经此路西运，故称丝绸之路。其他的商品以及东西方各种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在整个古代和中世纪时亦多通过此路。丝绸之路……亦有取道海上者，或自中国南部直接西航，或经由滇、缅通道再自今缅甸南部利用海道西运，或经由中亚转达印度半岛各港再由海道西运。丝绸之路在历史上促进了欧亚非各国和中国的友好往来。

《中国大百科全书》解释是：

中国古代经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通道。因大量中国丝和丝织品多经此路西运，故称丝绸之路，简称丝路。

丝绸之路不仅是东西商业贸易之路，而且是中国和亚欧各国间政治往来、文化交流的通道。西方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建筑等艺术，天文、历算、医药等科技知识，佛教、祇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等宗教，通过此路先后传来中国，并在中国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的纺织、造纸、印刷、火

药、指南针、制瓷等工艺技术，绘画等艺术手法，儒家、道教思想，也通过此路传向西方，或多或少地给某些国家以影响。至今，丝绸之路仍是东西交往的友好象征。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的界定更为详尽，云：

出（甘肃）玉门关往西的商路有两条：一条是从鄯善旁南山（昆仑山）北麓至沙东，西逾葱岭到大月氏、安息诸国。称为南道，再往西行可以到大秦（指罗马帝国）。汉的大批货物主要就是从这条道路运往西方的。另一条是沿北山（天山）南麓西行，越葱岭的北部西向，可以到达大宛、康居、奄蔡诸国，称为北道，再往西也可以到大秦……这南北两条商路，是当时中国和中亚、西亚经济交流的大动脉。因为运往西方的货物主要是丝和丝织品，所以后来把这条路称之为“丝绸之路”。^{〔2〕}

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在“丝绸之路的开辟”一目中，界定大意也是如此，云：

汉为了发展同中亚、西亚、南亚各国的交往，修筑了令居（今甘肃永登）以西的道路，设置亭驿，便利商旅。根据文献记载，当时通西域的道路大致为通过河西四郡，出玉门关或阳关，穿过白龙堆，到楼兰（即鄯善），自此分南、北两道。北道自此向西，沿孔雀河至渠犁（今新疆库尔勒）、乌垒、轮台，再西经龟兹（今新疆库车）、姑墨（今新疆阿克苏）至疏勒（今新疆喀什）。南道自鄯善的扞泥城，西南沿今车尔臣河，经且末、扞弥、于阗（今新疆和田）、皮山、莎车至疏勒。自疏勒往西，越葱岭，向西南，到大月氏（主要地区在今阿富汗境），再往西到达安息（即今伊朗），更西到达条支（今伊拉克一带），最后可直达大秦（罗马帝国东部）。自疏勒越葱岭往北，可到大宛（前苏联费尔干纳）、康居（前苏联撒马尔罕）。东汉时，与北匈奴多次交战，迫使北匈奴西迁，汉遂开辟了新北道。这条通道的路线是：由敦煌向北到伊吾，然后西经柳中、高昌壁、车师前部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经

焉者，越天山至龟兹。再循原北道西行抵疏勒。这些沟通中西交通的要道就是著称于后世的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从西汉一直到以后的唐代一千多年中，始终是中西交通的要道，成为我国与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国家和人民加强联系，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3]

丝绸之路，有的研究者以进出口商品来分类：就中国出口商品而言，可称“丝绸之路”、“瓷器之路”、“茶叶之路”；就外国进口商品而言，可称为“白银之路”、“香药之路”、“珠宝之路”、“玻璃之路”^[4]；也有的研究者以运输工具或所经过的地域而名之曰“骆驼之路”、“沙漠之路”，诸如此类。实际上，“丝绸之路”，就是古代中国与中亚以及西方国家之间经济、政治、文化交流道路的一个代名词。

最早提出“丝绸之路”名称者并非是中国学者。根据公元前4世纪印度孔雀王朝月护大王（Candragupta）的侍臣侨胥厘耶（Kautiliya）著《治国安邦术》（Arthśāstra）所记“侨奢耶和产生在脂那的成捆的丝”（Kaūseyam Cinapatt’ sea Cinabhumijāh），说明至迟公元前4世纪中国丝可能已输入印度了。而最早记录中国“丝路”者，是公元前4世纪的意大利作家克泰夏（Cetēsias）。^[5]但正式提出“丝绸之路”（Silk Route）的学术名称者，则是普鲁士（德国）的自然地理学、地质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25年）。他于1860年曾随同德国经济代表团访问、考察包括中国在内的远东地区，后于1887～1912年期间，陆续出版其五卷本著作《中国亲程旅行记》书中，于1887年出版的第一卷谈到中国经西域到希腊、罗马的陆上交通路线时，首次使用了“丝绸之路”（Seidentrassen）的名称，并加详细的论述。又在一张地图上提到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但未作阐释。之后，法国著名汉学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在其著《西突厥史料》（Documents Chinois Sur Les Turcs Occidentaux）一书中提出“丝绸之路”有陆、海两条，云：

中国之丝绢贸易，……其商道有二，其一最古，出康居之

一道；其一，为通印度诸港之海道，而以婆庐羯訾为要港。……为求丝绢谋与印度诸港通市易，而不经由波斯，曾于五三一年遣使至阿剌壁（Arabie）西南 yémen 与 Himyarites 人约，命其往印度购丝，而转售之于罗马人，缘其地常有舟航至印度也。^[6]

1910 年，德国历史学家阿尔伯特·赫尔曼率先接受“丝绸之路”的命题，并把自己的一部专著定名为《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路》。但至此时，“丝绸之路”一名仍未被人们所公认和普遍接受。

到了 1933 年 10 月 21 日，以国民党南京政府铁道部顾问、“铁道部西北公路查勘队”队长、瑞典人斯文·赫定（F·H·Lion）率领的考察队从北京出发，到西安，经河西走廊，然后沿着罗布泊北岸和孔雀河直至库尔勒，最后北上乌鲁木齐回北京，对“丝绸之路”进行了历时三年（1933～1935 年）的考察，最后编著了三本探险著作：《大马的逃亡》、《丝绸之路》和《游移的湖》，称为有关“战争”、“道路”和“湖泊”三部曲，共七十多万字。其中《丝绸之路》一书于 1936 年在斯德哥尔摩出版瑞典文版；在德国莱比锡出版德文版；1938 年在纽约出版英文版；1939 年在日本出版日文版，向全球介绍了“丝绸之路”，云：

丝绸之路全程，从西安经安西、喀什噶尔、撒马尔罕和塞流西亚，直至推罗，直线距离 4200 英里，如果加上沿途绕弯的地方，总共约有 6000 英里，相当于赤道的四分之一。^[7]

他还肯定地介绍一条从海上运输中国丝绸到地中海国家的“海上丝绸之路”：

在楼兰被废弃之前，大部分丝绸贸易已开始从海路运往印度、阿拉伯、埃及和地中海沿岸城镇。^[8]

在 20 世纪 40 年代，研究“丝绸之路”的学者不断增多。1942 年，法国著名汉学家格鲁塞（Rene Grousset, 1885～1952 年）出版了他的专著《中国史》一书，其中有 14 章篇幅介绍和论述“丝绸之路”。1945 年之后，法国当代最大的印度学和梵文学家让·菲

利奥札（Jean Filliozat，1906～1982年）开始致力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并于1956年出版《印度的对外关系》和1986年出版了辑录的《从罗马看印度、有关印度的古代拉丁文文献》（Inde Uue de Rome, Les documents Latins Sur Linde）两本著作，把自己研究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见解和文献介绍和阐述出来。

1955年，中国文化大师、北京大学教授季羨林发表了题为《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的五万多字长篇文章，提出“中国蚕丝的向外传播可能在公元前三四百年以前已开始了”，并提出“横亘欧亚的‘丝路’”命题。文章除了简述中国蚕丝向西域、波斯和西欧传播外，重点论述中国蚕丝输入印度的过程和道路，认为中国蚕丝输入印度“有五条道路：南海道、西域道、西藏道、缅甸道、安南道”。在论述“南海道”一节，就是引用了《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的“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这条最早的和非常重要的史料为依据，论证中国蚕丝从南海道的“雷州半岛发船”输入印度伊始，以后经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等朝代，“中国丝从这重要道路运至印度”，云：

综观自汉武帝以来中印海上丝织品贸易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在汉代运去的是“杂缯”，……到了宋代元代，中国海上贸易空前发展，于是“丝帛”、“缣绢”、“五色绢”、“青绶”、“五色段”，甚至“苏杭色绶”就大量运至印度。金乌古孙仲端《北使记》里记载，“（印都回纥）金、银、珠、玉、布帛、丝帛极广”。可见数量之多了。到了明初可以说是达到中印海上贸易的最高潮，中国的“纺丝”、“色绢”、“色段”、“白丝”源源运至印度。^[9]

20世纪60年代，法国著名学者布尔努瓦夫人（Llice Roulnois，1931～），也努力研究“丝绸之路”，并于1963年出版了具有严格限定意义的科学专著《丝绸之路》（la Route de La Soie，1963年）。该书法文版在巴黎重版三次，并被译成德文、英文、西班牙文、波兰文、匈牙利文、日文、中文出版发行。该书将“丝绸之